

日前,由郑晓龙、刘雪松执导,张嘉译、王珞丹、江珊、柯蓝等主演的都市医疗行业题材电视剧《急诊科医生》,展现了紧张的医患关系和复杂的人物网,严谨的创作风气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让该剧台词朴实无华却切中人心,看惯了郑晓龙导演的古装戏、年代戏的众多网友大呼过瘾,“郑晓龙作品”再次成为网络高频词。

从《渴望》到《金婚》,从《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到《甄嬛传》,从《四世同堂》到《芈月传》……郑晓龙这个名字一直与当代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相连。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郑晓龙策划、制作了多部引发轰动效应的电视剧,不仅多次获得“金鹰奖”、“飞天奖”等奖项,还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的诸多个第一。

艰难起步 渴望创造辉煌

1982年,30岁刚刚大学毕业的郑晓龙,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编辑。当时,作为全国第一家电视剧专门制作单位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只有一架摄像机,两间小平房,郑晓龙和其他30个人一样,谁也不清楚这个中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1983年,全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立了中央、省、地、县四级办电视的方针,中国广播电视台进入了一个超常的迅猛发展的时代。郑晓龙回忆说:“当时电视剧上下集就算不错了。记得当时‘飞天奖’里有一个‘丰收奖’,就是表彰那些一年制作电视剧总数能达到12集的单位。”

1984年,郑晓龙当上了主管电视剧生产的副主任。为了配合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平反工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根据老舍小说改编了一部28集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次拍28集的电视连续剧,包括郑晓龙在内的所有人都毫无经验。为了贴近时代,全剧组的人都骑车满北京去找老物件,最后淘到了八仙桌、条案、钟表等重要道具,就连剧中用的碗,都是拿新碗跟老乡换的旧碗。片子播出以后非常轰动,中央领导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片子第二年还取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双丰收。

《四世同堂》不仅开创了中国长篇电视剧的历史,也成为了此后郑晓龙参与的作品屡创收视奇观的开端。不过,《四世同堂》的热播并未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带来较高的收益。郑晓龙回忆说:“当时,做完后拿给电视台无偿播出,我们单位和电视台都是事业单位,拍电视剧是完成任务,没有赚钱的概念。”

1984年,就在筹拍《四世同堂》的时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引进了巴西室内剧《女奴》,收视反响非常好。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郑晓龙心中开始酝酿。郑晓龙说:“为了降低成本,能不能完全在室内拍一个电视剧?这样省了拍外景的费用,拍摄速度也快,符合电视剧流水线生产的发展规律。不过,首先是要组织剧本。”

1989年夏季的一天,在北三环的蔚蓝饭店,四个男人围坐在饭桌边吃边聊,谈兴正浓的他们,在天马行空地谈论着一个漂亮女人的话题。饭桌上的几个人,正是郑晓龙和作家王朔,以及编剧李晓明和郑万隆。而他们谈论的这个女人,就是后来红遍大街小巷的第一部室内剧《渴望》中刘慧芳的雏形。由于当时没有制片人、出品人之类的概念,郑晓龙他们给自己安的头衔是“策划”,中国电视剧产业中的“策划”这个职务就从那儿来的。

在等待剧本创作的同时,郑晓龙开始组织拍摄,他在香山租了部队的一个篮球馆,并把它改造成摄影



郑晓龙:平民视角贯穿35载荧屏生活

□本报记者 李睦文/图



棚,为此,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一年没拍片子,因为钱都花完了。而《渴望》的拍摄的过程,更被郑晓龙形容为“如同在造原子弹”。以声音为例,与以往拍电视剧先拍后配音不同,室内剧的拍摄要求同步录音。一开始,演员的声音太“空”了,由于担心观众看电视可能会听不清楚,于是他们在做布景前,先在里面蒙一层麻袋,在麻袋外面再加层布,然后再涂颜色。这样就使得声音更加清晰。“总之,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出国学习。当时,我们拍片子都没有钱。我们用的设备都是从北京电视台借出来的,大都是电视台不用了的旧设备。”

1990年年底,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渴望》终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此后,一到播出的时间,大街小巷都变得出奇的安静,“刘慧芳”的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渴望》剧组甚至得到了公安部的表彰,原因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在该剧播出期间犯罪率有所下降。《渴望》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但让郑晓龙苦恼的是,这部制作成本只有102万元,平均每集只有2万元的热播剧,最后只收回59万元,热遍全国的《渴望》竟然是赔钱了。如何才能让电视剧真正走向市场而赚钱呢?郑晓龙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1992年11月12日,郑晓龙带着整个摄制组和15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背负着沉重的压力,飞往了那个被称作既是天堂也是地狱的纽约。

贷款的巨大压力让摄制组毫无退路。郑晓龙是整个摄制组中唯一去过美国的人,在片场,他既是导演又是制片人,要随时处理和拍板决断现场出现的问题。

1993年,21集的《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马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再次创造了收视纪录。中央台用5分钟的贴片广告换取了《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这种合作让郑晓龙还清了银行的贷款之外,还有70多万元的盈余。不过,这并不能让郑晓龙感到满意:“电视剧前边除了我这5分钟广告,央视自己还加了更多的广告,首轮播映给他们带来的收入就有4000万元!影视剧生产是高风险行业,电视剧拍一个赔一个,偶尔有个赚钱的,也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根本不能形成规模化生产。钱被谁赚走了?现在电视台的收入平均有70%来自电视剧广告,小电视台可能占到80%以上,像央视这样大的电视台也差不多有50%,可是电视台用来收购电视剧的钱,连他们广告收入的5%都不到!”

为了破解电视台的渠道垄断,1995年,郑晓龙和28家省级电视台签约,买断晚间黄金档的一个小时,叫做“长青藤剧场”。这一个小时节目,电视台给郑晓龙每集两分钟的广告时间,而他就用这两分钟去广告公司拉钱。郑晓龙戏称这样的模式是用“小垄断”对抗“大垄断”,做了一年,播出314集电视剧,赚了1000多万元。

可是一年之后郑晓龙发现产品跟不上了。“这300多集电视剧是我好几年积累下来的,不可能第二年再保质保量地出这么多集给人家播。播出过程中也经常出问题,电视台会故意漏播广告,或者换他们自己的广告,因为他们也不高兴看到我垄断。于是‘长青藤剧场’运行一年就停播了。”郑晓龙的“小垄断”最

终还是没抗过“大垄断”。

紧跟社会 不忘创作初心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北京人在纽约》之后,又陆续拍摄了《无悔追踪》《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年又一年》《幸福像花儿一样》《生死十日》等热播剧。

2007年,郑晓龙导演的50集电视连续剧《金婚》成了全国的收视率冠军,北京地区的收视率甚至一度达到了20.83%。对此,郑晓龙表示:“《金婚》讲述的是一个常态婚姻,跟传奇无关。现在很多都市情感传奇剧,剧中动辄生离死别,情节离奇诡谲,但传奇不是生活的常态。毕竟,大部分老百姓过的依然是平常日子。相比于传奇,我更希望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有意思的细节。”

2011年,《甄嬛传》在大陆首播,红极一时;2012年,《甄嬛传》在台湾掀起收视狂潮。此后,“甄嬛小主”又在日本等多个国家收获了海外观众的认可。“片子剪成6集电视电影长度到美国播映时,(美方)做了一个30秒的宣传片,说的是‘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弱女子对抗整个大清帝国’,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艺评价中的一个标准——人性。”郑晓龙说,“《甄嬛传》《芈月传》都是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态度进行创作的。它并不虚幻,情感都是真实的,讲述真实的人性故事,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观众反而特别喜欢。”

此后,郑晓龙执导的不少电视剧中,如古装戏《芈月传》、年代剧《红高粱》,虽不是现实题材,但都是现实主义作品。

“玄幻的(电视剧)不可能成为(中国电视剧的)‘高峰’。”今年,郑晓龙在参加“2017中国电视剧导演——上海论坛”时称,“现实主义作品才有可能真正地走向国际。”他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现实题材只不过是一种题材;现实题材的片子可能和现实主义没有关系,古装戏、历史剧里也可能有现实主义。对于社会的一些负面和黑暗,郑晓龙直言,影视工作者要直视,要“直接面对而且揭露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避而不谈不行,你不谈它不会被揭露掉”。郑晓龙透露,“电视剧要对社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要追求震动社会的效果。记得《渴望》播出的时候犯罪率下降,然后《北京人在纽约》播出的时候就出国率下降,《金婚》播出的时候是离婚率下降”。因此,创作新剧《急诊科医生》,也是郑晓龙希望能对中国的医疗改革、医患关系的缓和起到积极作用。

与郑晓龙合作多年的编剧李晓明,更曾用“高处俯瞰、低处扎根”来形容郑晓龙的职业状态。在他看来,郑晓龙如果打仗,应该是个能够带兵的将军;如

果从政,也是个为民奔走的官员,但好巧不巧,他从事的是娱乐行业,“高处俯瞰,因为他是高人;低处扎根,不是他的主观需求,而是行业的要求。晓龙作为一个电视人,他一直在努力的就是使电视剧同时具备娱乐大众和人文情怀的双重特点。”

百“剧”齐放 精彩源自平民视角

在近年的国内电视剧市场上,无论是剧种,还是数量质量,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各类型的电视剧竞相登陆各大电视台,掀起一次次收视风暴。今年1月7日,在深圳举行的2016中国(深圳)国际电视剧节目交易会上,《中国电视剧2016产业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1月至9月共备案电视剧892部34946集,数量再创新高。根据CSM媒介研究TVPRIS100城市组的监测数据,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全国有电视剧播出的473个地市级以上电视频道,共播出电视剧25387部160万多集。

在中国电视剧产业空前繁荣的今天,郑晓龙却对接拍作品越来越谨慎。郑晓龙称“求真”是他在创作中最看重的。

“经过近30年发展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再融资方面还是有所突破的。”郑晓龙介绍,作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自己拍摄《渴望》时的100万元,从申报到资金到位,没少费劲儿。后来的《北京人在纽约》是他们从银行贷款拍的。“现在肯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像我们中心投拍的剧目都有民营资本的投资,但是制作由我们来掌控。因为文化产品的政策性很强,很多民营公司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往往把握不准,拍了片子被毙的不在少数。因此,国有单位和民营资本的结合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

投资虽然不用再发愁了,但郑晓龙慨叹于过去那种磨剧本、磨镜头的氛围不再了。相反,浮躁的心态、一味的模仿成了中国电视剧创作最大的弊端。“现在的电视剧创作比较浮躁,一些编剧、导演、制作公司都在急于拍片、急于挣钱,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拍片的人越来越少。”

谈到未来,郑晓龙希望,今后在电视剧生产方面能够有一个比较公平的政策环境,从事文化产业的人能够踏实下来,认认真真地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拍出一些让老百姓真正喜欢的作品。“踏踏实实进入生活,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心。生活会提供你源源不断的素材,我们现在很多搞影视剧的把自己当成了‘贵族’,这是不对的。不把自己当普通人,没有平民视角,怎么能够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坚持老百姓的视角,拍老百姓喜欢的东西,那么老百姓也一定会看你的作品。”他真诚地说:“我相信中国电视剧的明天会越来越好。”